

From Passive to Activ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Public Presentation of Diary

Hu Shenming He Wenxi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everyone can speak. When individuals become media and diaries become means of individual publicity, they often have strong conflicts with public interests and media industry. To clarify the process of diary public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boundaries of individual and public expres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ity of “dia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diary of heroes and great men were the main ones, because the mainstream media endowed them with public value,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period, the diary was mainly made public by individuals, and the “right maintenance”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struggle of diary, which was easy to cause the loss of social expectation and self worship; nowadays, the publicity of “dia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way of writing is to fight for the right to speak through “identity deviation”. This kind of individual diary not only has an impact on the media industry, but also leads to difficulties in network governance. Therefore, the public space should establish a multi content standard system, individuals should strengthen self-discipline, and jointly build a good network social space.

Key words: Passive; Active; Diary; Role shift

Received: 2020-11-12; Accepted: 2020-12-28; Published: 2021-01-25

作者简介：胡沈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新闻评论、新媒体与社会变迁。何文霞，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变迁。

文章引用：胡沈明，何文霞. 从被动到主动：“日记”公共呈现的历史探究[J]. 中国新闻评论，2021，2（1）：86-94.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1008>

从被动到主动：“日记”公共呈现的历史探究

胡沈明 何文霞

摘要：媒介技术的发展让“人人皆可言”，当个人成为媒介，“日记”成为个体公共化手段之时，往往与公共利益、媒体行业产生强烈冲突。厘清“日记”公共化历程，对理解个体、公共表达界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日记”公共化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早期被公开的日记以英雄日记与伟人日记为主，缘于主流媒体赋予其公共价值，对社会建设有重要作用；中期主要以个体主动公开，通过日记这一抗争的方式进行“权利维护”，容易造成社会期待丧失与自我崇拜；如今出现的写作方式是通过“身份偏移”来争夺话语权，这种个体日记对媒体行业造成了冲击，也导致了网络治理困难。由此，公共空间中应该建立多元内容规范体系，个体应该加强自我约束，共同建设良好网络社交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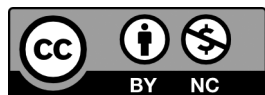
关键词：被动；主动；日记；角色偏移

收稿日期：2020-11-12；录用日期：2020-12-28；发表日期：2021-01-25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日”是时间的连续，也是空间的日常。日记属于个人，具有主体性和私密性^①。日记的功

① 王旭辉，李先知．私人书写与公共叙事：国内日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社会发展研究，2018（4）．

能在于将记忆深化并再现^①，它比别的文体更鲜明地表现作者的个性，记录着作者“不欲与人所知”的所想所为，一般情况不公开^②。然在公共领域中却出现了“公开日记”。从早些年被赋予公共价值而公开的英雄“日记”，到现在利用“身份偏移”进行权力争夺的个体日记。实则是技术发展下个体表达、公共表达的界限模糊。这种通过个体、技术、平台三方联动造成的“表达失误”，极易产生社会冲突与“个人专业幻象”，对社会治理产生较大困境。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媒体行业从原来由政府完全控制到依赖网络技术发展，“日记”公共化的意义与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个体对于“事实”的记录已经不再是个体表达，而是具备个人与公共两种属性。描述这种变化的历程，对理解社会冲突，如何看待自我表达、社会表达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1949—2009年：“有限式”被动公开与意义赋予期

日记在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最早的日记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日记本是属于隐私范围，表达的是个人真情实感。新中国成立后，媒体上“公开”日记逐渐增多。从英雄日记到伟人日记，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各类日记摘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公开的日记被赋予了社会价值，但本质上是国家政治宣传的手段，是协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一）产生背景：政府主导的国家话语转向幕后

1950年以后，“我国境内的报纸全部成为党报”^③。此时媒介技术发展较为迟缓，主要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法律法规管理媒体，新闻媒体也主要依靠政府来维持经营。由此，媒体主要接受来自行政机关的各项指令，在行为准则和报道内容上坚守党性原则。媒介的作用也由建国前的舆论宣传到建国后的政治传播。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由原来的以公有制为主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时，事业单位改革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后，《人民日报》等八大报刊实行了“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方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启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体制改革，让大批事业单位焕发生机与活力。受到社会改革的浪潮影响，各种媒介活动已经不局限于政治指令，而是具有了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市场化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也逐渐兴起，这部分媒体更多宣扬“传承精英思想和价值观念”，并通过“服务公众利益”的态度建构属于媒体的新闻理想。同时，在策略上注重媒体工作者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因此，媒体们在内容上呼吁知识的引进，试图强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国家意志并没有消失，国家政

① 张放，尹雯婷．从独白式微博书写看媒介中介化自我传播[J]．当代传播，2012（4）．

② 黄亚海．关于日记、书信集在《中图法》三版的分类问题[J]．图书馆论坛，1992（5）：19-21+10．

③ 李建刚．技术变革与广播媒介转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65．

治话语在这个过程中由显性走向了隐形。

（二）具体表现：从“英雄日记”到“伟人日记”

这一时期，个人日记成为政府、媒体构建社会学习、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这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雷锋日记”，它最早是由《前进报》在1960年12月1日刊发，标题为《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除了报道雷锋日记，各个报纸也纷纷也报道了欧阳海、王杰等英雄日记。日记开始成为英雄模范的代名词，成为表达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的载体。简单说，以往时代日记写作是国家倡导和推行的一种政治仪式^①。它是被传统渠道限制公开，这种被公开的日记与原本的个人日记已经有了显著差别，它们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增、删和改等修饰，传递着某些社会价值观念。

除了公开的英雄日记，也有越来越多的伟人日记通过出版形式走向公众视野。1993年《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2》后附《近代日记知见简目》就收集了300多种文人日记^②。而在《历代名人日记选》《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等书籍中也记载着《吴宓日记》《曾纪泽日记》《俞平伯日记选》《蔡元培日记》等日记。这些以多种形式出版的日记，成为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重要文献。以张友良先生的日记为例，他的日记对城市规划史研究具有独特价值。此外，还具有了记录城市规划工作者日常生活并展现其精神风貌的专业之外的价值^③。近代名人胡适先生的日记也被看作“中国近现代文化史重要文献”。为大众所熟悉的“鲁迅先生日记”看似记录的是“信礼往来”“银钱收付”，但对于研究文学作品、社会生活来说，仍是不可多得的物证。可以说，用日记研究历史已经成为史学研究重要取径之一^④。这些通过官方渠道所公开的伟人日记，更像是一个“私人修史”的过程，成为“正史”的补充与修饰。

应当明确，英雄日记和伟人日记的“有限公开”是基于公共价值，它们是被主流媒体限制公开，它们的公开传播不仅传递着某些社会意识，而且对社会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影响：凝聚人心与促进发展

媒体机构由最初直接传递政治理念到隐形传达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集体认知，促进了社会发展。从个人本位出发，人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凝集人心就是凝聚共识、凝聚力量^⑤。而要想凝聚人心，就需要从个体经历着手，唤醒集体记忆。在群体记忆中，“艰苦奋斗”“奉献精神”等都是能汇聚情感的力量。从表现形式看，国家意识以“集体主义”

① 吴艳红, Knottnerus J D. 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J]. 社会, 2007(1): 98-119+208.

② 郑逸梅.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2[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833-847.

③ 李浩. 日记对规划史研究的独特价值——试以“张友良日记”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2): 1-8.

④ 陈岭. “顶级资料”：日记开发与历史研究新境[J]. 理论月刊, 2018(2): 81-88.

⑤ 方立明, 奚从清. 凝聚人心的几个本质性问题[J]. 理论月刊, 2014(7): 150-153.

的形态出现，比以往直接表达更显柔和，集体符号下的灌输更加容易生成情感共鸣。而以“党的工作者”为基调出现的公开日记，作为集体主义的缩影，具备了社会性、深刻性、一致性等特征，更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对动员群众有着深远影响。

当个体日记被授予政治属性、集体属性以后，以“报纸”等媒体为主的隐形“向外辐射”机制得以形成。对媒体行业来说，拓宽了宣传资源，抓住了受众的注意力。对传播内容影响来说，个体日记能够从细节之处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也为社会沟通搭建桥梁。而对于社会上的普通大众来说，以“真情实感”出现的英雄日记和伟人日记，更能激发自我学习、确立自我学习计划，并进行自我反思。在社会各方努力下，文本中“热情”“理想”“政治青春”等被化作为进步的决心，继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

二、2010—2014年：“抗争式”主动公开与权利表达期

近些年，新媒体时代下的“日记”成为大众“用注入意义的方式”在公共空间讲“日常故事”^①。这其中，个体日记主动公开化意味着自我泄露，其所建构的自我被他者全方位审视^②。从“局长日记”到“个体日记”，都是普通人利用网络进行抗争活动，是对传统渠道的失望，也是对“监督者”自我幻象的沉迷。

（一）产生背景：媒介边际扩大和社会矛盾凸显

相较而言，这一时段是网络快速发展的重要节点。2010年初始，互联网网民将近3亿。随后，腾讯公司在2011年推出微信平台。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应用的兴起拉开“移动社交”的序幕，整个市场渐渐呈现集中化趋势。这也让“物联网”概念不断扩充，包括百度在内的互联网企业也实行“开放计划”。基于媒介技术下的互联网正带给民众更多可能。2013年12月4日，我国移动产业走进4G时代，网民们更加自由地分享信息资源。直到2014年，短视频等媒体形态崛起，我国也提出了实现“四全媒体”“信息三无”的目标，媒体边界不断扩大，这一年也被称为“融合元年”。界限的融合与消失催生了不同形态网络媒体的出现，自媒体就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集中爆发^③。从2011年的贫富差距问题、2012年社会安全问题、2013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到2014年阶层与利益固化问题，社会矛盾通常在网络中表现出来^④。这其中，群体性冲突事件日益增多，拆迁事

① Papacharissi Z. Towards New Journalism (s): Affective news, hybridity, and liminal spaces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5, 16 (1), 27-40.

② 黄健. 被围观的私语——名人日记出版现象观察 [J]. 中国图书评论, 2014 (10): 114-117.

③ 李雪冰. 风险社会环境中的犯罪防控研究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7 (3): 41-49.

④ 陈玉娟, 杜楠.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学术研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2016研讨会综述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6 (4): 152-160.

件与民工讨薪之声此起彼伏^①。可以说,2010年始,“北京最牛钉子户”“浙江最牛钉子户”“安徽最牛钉子户”等事件在网络上层出不穷。不仅如此,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也倾向于在网络上表达诉求。2012年10月女民工苗翠花举办“民间新闻发布会”讨薪事件就是民众维权新模式^②。

(二) 具体表现:从“局长日记”到“个体日记”

这个阶段,个体、群体的日记,已经让日记的写作内涵发生了改变。一方面,艰难的生存环境,内心的迷茫和孤独的侵袭,让日记写作摆脱了政治仪式的特征,成为行为人缓解压力的渠道。另一方面,日记代表着个人的事实、情感、观点。这种意义之上的日记公开化行为已经介于隐私和公共之间,本质上是情感出现了异化。具体来看,2010年2月28日网友“含仙子”公开了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的“香艳日记”,记录其贪污受贿等行为,引起极大轰动。随即,2011年11月网民匿名发布题为《腐败书记微博》的日记,影射湖北恩施副局长谭志国违法行为。2012年12月12日,常艳在网络社交平台发表12万字日记《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讲述与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过往。在人际交往中,这种暴露属于情感疏离。个体因为与他人情感产生破裂而曝光鲜为人知的曾经,也属于自我权利表达与自我抗争的手段。

传统公共空间中拥有话语权的群体为记者与政府官员,普通个体很难拥有话语权。这其中,记者拥有话语权是媒体所赋予的“特权”,官员拥有话语权是组织渠道的权威性决定的。而网络公共领域中,由于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利益矛盾的存在。“权利意识”成为抗争个体关注重点。它虽来源于个人私欲,更体现在社会 and 集体层面的需求^③。这时,技术让媒介超出了既有属性,成为整合、动员民间团体和群体性活动的免费工具^④。它成为大众互动与参与的有效工具,也提供了更多表达方式、表达权^⑤。

同时,在民主思想熏陶下,底层个体为了争取自身利益,开展了各种各样社会抗争^⑥。2014年11月8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提交多篇文字材料举报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存在学术不端现象,引发热议。以往空间中,普通不具有特殊身份的公民,除了通过正规渠道发声,自身诉求很难被关注。而正规渠道中的部分程序繁杂等让民众望而却步。自媒体平台让这些区隔不再是屏障,民众利用网络进行情感宣泄、利益表达,不断扩大社会动员潜力^⑦。

① 贺银凤. 转型期群体性冲突调节机制探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3(4): 26-32.

② 邱新有, 刘婷. 民间新闻发布会: 底层民众维权的新模式——以苗翠花讨薪事件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 35(6): 89-91.

③ 蔡文之. 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8.

④ 韩娜. 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影响的研究——基于批判的视角[J]. 新闻记者, 2015(8): 81-86.

⑤ 宋晖. 社区赋权: 当代社区的传播和文化实践[J]. 人文杂志, 2014(3): 108-112.

⑥ 刘珣. 社交媒体语境下社会抗争的自我认同[D].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⑦ 何志武, 吴丹. 从“他助”到“自助”: “心理不悦类”“邻避”冲突事件中的媒介选择、自我动员与集体抗争[J]. 新闻大学, 2017(4): 81-89+149-150.

（三）社会影响：丧失期待与自我沉迷

一直以来，新闻事业与党的事业是同步前行的，具有“崇高地位”。媒介技术的演进让媒体形态多样化，自媒体平台的出现，传统媒体的垄断局面进一步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负面信息通过自媒体平台曝光，而传媒媒体并没有给与积极的回应，这就使得主流媒体信息传播存在相对滞后，也引致传统媒体“衰弱趋势”。这一进程中，媒体从业者对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产生失望情绪，对传统媒体引导力产生困惑。而对于受众来说，传统媒体权威性信息减少，多元力量抗衡局面展现，私人化负面文本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浮现，极易对社会发展丧失期望。

另外，社交媒体发展让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模糊，人们在网络中的交流往往透露出非理性的特点。这种非理性的特点不似现实生活中的“身体冲突”，更表现在个体“公平、正义”形象的塑造。日记文本分析表明，创作者往往伪装“社会监督者”这一角色。尽管自媒体人一定意义上对于社会管理做出了贡献，但实际上仍是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容易酿成其他冲突。人们利用媒体工具，对社会现象进行抨击，表达着自我权利，收获传统渠道没有的“胜利”，由此不断产生抗争行动。当然，网民们维护着自我权利的同时也收获了认同。于是，网友们沉浸在自己表达中，仅接受与自己一致的观点，在虚拟的“自我”中逐渐迷失。

三、2015—2020年：“偏移式”自我公开与权力争夺期

日记作为不与他人交流的封闭性文本，在强烈的感情作用下，很多感受与事实被想象、强化或放大，是具有主观想象的写作，而现在被缔造成一种“真实”的写作^①。言说者在进行观点表达的过程中，已经超脱原有身份，转而不受限制地从公共视角去完成个体论述。“偏移式”的自我公开，实则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极易导致伦理缺失与网络治理困难。

（一）产生背景：公私界限模糊与文化危机加深

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互联网大会首次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望打造“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2016年人工智能的兴起、斗鱼、美拍、网易等“直播大战”更是强调了虚拟“在场”的重要性。应当说，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了原本碎片时间与空间，新媒体发展让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界限日趋混淆。普通人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另一边，Web3.0的“个性化推送”等特点降低获取信息成本，多渠道融合实现了传播高效率，也让海量信息充斥整个公共空间。当媒体高调走进民众生活之时，信息在各个领域扩散的速度已经无可比拟，如何在庞杂的信息中辨明真假、观点表达、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话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领域私人化、私人领域公共化，让个人表达与社会表达的壁垒已经消除。

^① 张福萍. 日记与自我幻象——大众文化叙述策略研究之一[J]. 当代文坛, 2012(2): 39-41.

而从自媒体发展来看,媒介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社交习惯,“注意力经济”占据大众生活主要地位,文化危机出现。“内容为王”的策略在“流量为王”的当下有下降趋势,“网红”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碎片化、娱乐化的需求被无限放大。技术赋权下的文化价值趋向窄化,网民表达中两极态势更加明显。情绪表达偏激、真实真相扭曲、客观理性欠缺等负面影响造成舆论危机与混乱状态^①,文化危机进一步加剧。

(二) 具体表现:从“返乡日记”到“方方日记”

2015年2月1日,上海大学王光磊在上海图书馆进行《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主题演讲,用“城市”“知识分子”的视角讲述中国乡村现状,引发关注。其在“市政厅”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成为2015年初热度最高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全国各地的网友针对日记中提出的城乡差异,联系自己生活经历,提出了不同观点。随后,2015年12月5日,学者黄灯在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中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以我的哥哥嫂子为例》为题,用“农村儿媳”等视角讲述中国普通家族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关联。2016年1月27日微信公众号“当代文化研究网”以日记形式将其全文转载,众多网友表示“真实”“感动”,一时间成为新闻热议话题。2016年2月4日“财经”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了题为《春节纪实: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的随笔,吸引网友对于农村“礼乐崩坏”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固然是属于虚假写作,但人们对于返乡书写的讨论却愈演愈烈。这是由于相对私密的自媒体平台让“本我”充分展现,各种情绪、态度和观点多以原生态形式外显^②。

换句话说,原来的“公开日记”是经过官方媒体有意刻画后公开,自媒体平台的出现让个人可以在一定空间中自由说话,但网民们却没意识到属于隐私层面的日记与公开日记的不同,或者意识到却没有更改。私人化表达在隐秘空间中无法规避对他人、公共事件的描述,这些表达不经修改走向网络必然造成冲突。对于传播者来说,他们也需要用这种冲突来迷惑受众,掠夺话语权。于是,网络日记作为个体表达文本,在“媒介化的自我传播”^③中出现了角色偏移现象。

直至2020年,这种角色偏移的写作方式依然兴盛。这其中,2020年1月至3月的“方方日记”最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文本采用的仍是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私人事实”,但其内容已经不局限在个人事件的陈述,转而走向对公共问题探讨。这些公共问题的讨论也并非日常话题中的“小打小闹”,汇集的是公共空间中的“尖锐问题”。私人话题与公共话题的掺杂,让私人个体与社会论述的边界出现了杂糅。在论述的过程中,作者往往采用“记录”的噱头吸引大众目光。文笔中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意味是实现记者等身份跨越的方法,由此达到某种个人目的。

① 孙光磊. 5G时代新媒体传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争[J]. 中国出版, 2019(24): 48-50.

② 高健. 自媒体时代社会舆论传播、演化和引导的全过程研究——评《社会舆论传播、演化和引导——网络建模与仿真视角》[J]. 新闻界, 2020(6): 95.

③ 张放, 尹雯婷. 从独白式微博书写看媒介中介化自我传播[J]. 当代传播, 2012(4).

（三）社会影响：伦理缺失与管控艰难

个体利用“记者”等视角进行的日记写作，实则是自我情感表达与话语权的争夺。这种以情感表达为目的，却又以公共文本呈现的日记形态，其道德伦理问题不容忽视。为赢得更多的关注，创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忽略信源的真实性，一味以煽动性的话语引发社会争论，造成网络舆情问题。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也让主动公开的个体日记失去媒体赋予的公共价值，成为赚取“流量”的噱头。当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公共文本中能引起共鸣的情感、美好品质被掩盖。

普通的个体未能具备记者的专业素养，却又通过记者视角进行“日记”表达。这种身份的逾越，是“日记”呈现的新形式，是对其他职业特性的冲击，也是对记者、评论员等专业人士的“挑战”。从更深层次角度来说，这是个体对话语权的向往与“掠夺”。话语生产的专业场域与公共场域含糊不清，在边界移动的背后，是社会角色的变化，是知识权力与支配关系的重组^①。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媒体虽让话语权出现了下放的现象，却让话语权的抢夺更加强烈。由网络话语权争抢而出现的混乱场面，对于公共领域的建设并没有更多意义。反而对公共安全、网络治理造成困难。与以往管控有所不同的是，链式传播让新媒体时期的网络治理更为艰难，无法单一从某一个方面进行规制。

四、总结与建议：健全内容规范体系与自我约束机制

从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公共场域中“个人日记”由最初传统媒体的价值赋予沦为自我表达的工具。个体日记的内容也从“自我记录”到探讨“公共议题”。这一现象常常导致传统媒体公信力下降、公共场域中二元对立的局势。究其原因，媒介技术的发展让个人可以利用平台进行观点表达，与不同阶级人群进行互动交流。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体系的不健全让这场“平民化”运动跨越到陌生的专业领域，从而出现“新闻失实”“自我崇拜”“解读泛化”等问题。

基于此，首先，需要建立多元的内容规范体系。以政府强大的管控力为主要力量，设置内容、话语、价值导向多个评价标准，加大对网络文本的审核力度。同时，提高网民道德伦理建设，意图对越轨群体进行规制，将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区隔，从源头解决“日记”异化问题。其次，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增强对不良信息的甄别能力，对自身利益诉求采取更加正当的方式进行阐述。在进行公共表达之时，应该反思自我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而不是对不同情境、事件的处理能力。应当进一步明确的是，个体要加强对自我表达的监控，对所思所写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述，自觉承担起公共领域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同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① 谭学纯. 话语生产：专业场域和公共场域[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130.